

●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 / 编

复旦 社会学 论坛

(第一辑)

 上海三联书店

●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 / 编

复旦 社会学 论坛

(第 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社会学论坛.第1辑/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10

ISBN 7-5426-2174-2

I.复… II.复… III.社会学—文集 IV.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97937号

复旦社会学论坛(第一辑)

编 者/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王秦伟

装帧设计/陈芸

监 制/林信忠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 www.sanlian.com](http://www.sanlian.com)

E-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

版 次/2005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5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x1092 1/16

字 数/256千字

印 张/14.75

ISBN 7-5426-2174-2

C·112 定价:25.00元

编委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海 刘欣 张乐天 范伟达 范丽珠

胡守钧 彭希哲 谢遐龄 瞿铁鹏

执行编辑 曾亦

编 前 语

昔者宣尼有云：“温故而知新。”盖欲学术之反本也。惟其如此，斯能斟酌后世之制作，而时变之滔滔，莫不入吾纲目矣。甲午之役，吾国不幸，而改作之论竞起，异说滋行，至有效祖龙一炬而施诸吾圣经者。政乖俗变，昧乎大理，人伦以来所未曾有也。其后异域之学术藉此而入，自居普遍之真理，而行变夏之实际。吾国之于西学，始则利以制夷，继则慕以向风，终则托钵矣。此诚古今学术之大变也。

社会学起于晚近之西域，本非古学，而渊源有自，遂有今日之盛。故不考诸古典，无以知现代；不究诸理论，无以济实际。先贤筌路蓝缕之功，未可忘也，故学术务反本，先河而后海，此自不待言。又，吾国旧有学术，而以斯文载斯道，真实学也。辛亥之事，非独一国之变，亦五千年名教人伦之变。幸与？不幸与？难言也。斯道既隳，斯文遂以扫地，而斯文斯道之学沦为俗学，唯逢迎时尚、牵引异学是务。近百余年间，多少学者皓首其间，而于事理之实际，渐行渐远矣。其中有一二可观者，不过庸中佼佼而已。

天运循环，剥极而复。国初，治道休明，故不有学术。近二十余年间，学术始大盛，百花齐放，至于薰莪多元，同堂异室。流风余韵，寝及一世，多有矜其隐私、肆其权利者，而家国之义务荡然矣。世人尚奔竞，汲汲于市场，以学术自售，而不复沉潜涵养之功，此学术之又一变也。至于摛诸异学，宾师古昔者，吾未闻其人也已。

近日院系调整，社会学系与人口所合并而成立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期以社会学系之新生，当不为过也。今适值复旦百年校庆盛典，又及社会学系八十周年系庆。职此之由，院系诸君共襄赞之，而编定此文集。揆诸将来，吾系学术或藉此而得贞元之机，洵所愿也。

谨以为序。

目 录

完善社会政策体系 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彭希哲/ 1
文本与世界	
——给新闻学院博士生的讲座纪要	胡守钧/ 10
1930 年代中央苏区的农村社区重建	
——中国当代社会建构之一	谢遐龄/ 21
古典社会学中的社会关系概念	瞿铁鹏/ 37
一生倾心研究的富民课题	
——费孝通的农村工业化思想	刘豪兴/ 56
中国人宗教经验之意义与中国宗教的内涵初探	范丽珠/ 71
中国古代乡里社区组织的嬗变及其与	
国家关系的两面性	王威海/ 90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与涂尔干对康德哲学的阐释	曾 亦/ 107
合众法整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原理、架构和案例	顾东辉/ 130
中国城市的住房不平等	刘 欣/ 149
质化研究的质量:一个半根基主义的观点	曾 群 魏雁滨/ 172
城市邻里研究:“国家——社会”范式及一个	
可能的分析框架	桂 勇/ 194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八十周年纪事	范伟达/ 207

完善社会政策体系 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彭希哲^{〔1〕}

一、社会政策体系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构建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正在成为我国现阶段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发展战略的核心,其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以人为本,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发挥各种人口群体的作用,在发展成果的股份中实现平等应当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条件。社会政策体系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都实行一定的社会政策。如果从 1834 年英国的“济贫法案”算起,现代国家的社会政策已经有 170 多年的历史,社会政策作为一个学科开始于 20 世纪初。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今天,政府实行的、与经济政策相对应的社会政策已经今非昔比,其涵盖的内容和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日益广泛。由此也导致社会政策的多种定义和学者为此进行的研究和争论。但一般研究者主要将社会政策作为一种干预行为,是政府借以对市场功能进行修正,以更有效地配置与卫生保健、教育、住房、收入维持等有关服务领域的资源,并进而影响社会福利、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参见 M. Lavalette、A. Pratt, 1997)。同时,社会政策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而是一个领域,它需要其他社会科学的支持。

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将社会政策当作是主导的经济政策的补充,而忽视其对经济发展内在的推动作用。实行社会政策的一个主要目的

〔1〕 彭希哲(1954—),男,江苏镇江人,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中国人口动态、社会经济变革和劳动就业、农村社区建设与人口控制、社会转型期的妇女问题、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研究。

是通过政策干预来进行收入再分配,包括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进而实现社会平等。也正是这一目的,使得社会政策和各种社会福利项目常常被认为是与经济增长争夺资源,或将其仅仅当作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只是平衡“平等与效益”关系的工具,而忽视了其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和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人们日益认识到,快速的经济增长常常伴随着贫困与不公平,希望通过单纯的经济增长来消除贫困和分配不公平已经被事实证明是不现实的。必须通过有效的社会政策体系来提高社会整合度,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并最终有利于经济的增长、社会经济和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

中国作为拥有近 13 亿人口的超大规模的社会,又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社会政策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超大规模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人口的众多和城乡地区差异的巨大。目前,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 4.5 倍,日本的 10 倍,是原欧盟 15 个国家总人口的 3.3 倍。虽然中国控制人口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中国人口还将继续增长。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同人口问题交织在一起,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与社会经济发展、资源存量、环境质量等方面的矛盾十分突出。人口生产的显著特点是增长的惯性和影响的长期性。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加速、失业下岗等问题都可以从过去的人口发展中找到原因。中国人口数量从许多角度来讲都已超过社会经济负荷能力和合理的资源承载容量,对社会构成全面的压力和危机,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之一。同时,中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这些作为超大规模社会的特征使得中国的社会政策不可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只能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政策体系和管理模式。

二、我国现阶段社会政策体系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政策体系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其制度设计的目标和理论基础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首先,我们目前诸多社会政策都是以经济改革服务为主要目标的,特别是围绕国有企业的改革而设计的,因此,作为经济改革措施的配套政策的特征明显,缺乏社会政策的、独立的主体性。人们习惯于将社会政策当作是主导的、经济政策的补充,而忽视其对经济发

展的、内在的推动作用。社会政策往往是按照占主导的社会结构来设计的,体现了社会分层和利益的多元化。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正在不断打破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的平衡,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阶层和人口群体的、新的迅速分化,重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经济结构调整对人群的影响是多层次的,呈现出显著的年龄、地区、行业和性别的差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农村,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在城市,社会政策改革也集中在城市。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改革等主要都是在城市进行的。而在目前的社会政策体系中,城市人口中心、公务人员优先、国企职工利益维持等特征很明显,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人口的基本保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社会政策本身的目标定位,削弱了社会政策的效果。

与城镇居民普遍享受社会保障福利不同,广大的农民群众基本上被排除在政府支持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下岗职工和农村人口是最需要通过社会政策的帮助,以获得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的,但随着社会弱势群体经济地位的低下而产生的政治话语权的丧失,使得他们没有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发表意见的必要途径,从而也失去了他们的利益在社会政策中得到必要反映的渠道。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的差距不断扩大也就不足为奇了。社会弱势群体经常是不成比例地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结构调整的成本,而我们的社会政策至少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在校正这一倾向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其次,我国当前占主导的公共管理和社会政策理论,无论是其体系还是方法论,基本上是从发达国家借鉴过来的。作为一门科学或学科体系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在中国存在的时间很短,其发展轨迹基本与改革开放同步,并通常是作为政治学科的一个分支来发展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面临的巨大社会变革和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提出了公共管理的命题,并将其迅速地发展成一门显学。在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学者和官员也必然只能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本领域的现成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和模仿,来发展中国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学科。因此,人们对中国社会政策的评估也往往以从西方社会的一定时期的历史经验中提升出来的理论和原则为基础。

国际比较表明,与发达国家相比,后发国家有可能利用后发优势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阶段就利用社会政策工具并开始建立覆盖广泛的社会保障体制(Thandika Mkandawire, 2001)。同时,全球化的进程又使得社会政策在一

定程度上超出了一国或一个地区的范围,产生社会政策国际趋同化的倾向。^{〔1〕} 各种国际组织通过推行国际社会达成共识的、某些基本的社会发展目标而对各国的社会政策产生影响。联合国新千年社会发展目标的确定和国际劳工组织所发起的、旨在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基本的收入保障和健康服务的全球运动就是例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中国的社会政策体系必然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巨大影响。但任何社会政策和社会项目的制度安排都必须扎根于传统文化之中,体现中国的特殊国情,虽然各国的社会政策领域的许多技术方法和基本思路存在基本的共通之处,在中国这样一个有 13 亿人口的超大规模的转型社会实施的任何一项社会政策都可能是没有先例可循的。

同时,由于发达国家近十多年来正在经历社会政策领域基本理念和制度体系的变革,传统的福利国家制度的欧洲模式或完全依靠市场的美国模式都面临巨大挑战,出现许多新的理论方法和政策设计。这给中国的官员和学者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发达国家的问题,也使得我国的社会政策领域在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先天不足更加凸现。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社会政策体系和公共管理本土化发育的路径和特点,对于中国社会特殊的超大性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和政策措施的指导性。

最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力首先来自政府,而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社会政策的行为主体发生变化,但社会政策的体系完善过程明显滞后。这突出表现在社会政策的部门协调性较弱和公民参与体系尚未形成,社会政策依然主要由政府部门的少数精英制定。我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已经越来越依赖于强大而有效的政府及其公共管理体系。政府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决定着中国普通百姓的就业和福利保障的保护程度,以政府行政方式动员社会资源投入社会政策领域的发展仍处于主导地位。为了实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统筹”的发展目标,社会政策体系内部以及社会政策与其他发展政策之间也必须达到统筹协调。社会政策涉及多个政府主管部门,但不是部门政策的集成,而应当是一个完整有效的政策体系,是一个通过相关的主体政策和辅助性的社会政策有机整合而形成的政策体系。各种政策和项目之间存在相互支持和互补的关系,从而达到通过整体性社会政策的制度安排实现内在的一致性和广泛的

〔1〕 The Social Security Policy and Development Branch, ILO, Global Campaign on Social Security and Coverage for all.

适用性,促成社会发展整体目标的实现。由于公共权力不清晰,目前,以各政府部门为主体制定、实施的社会政策常常表现出政策措施之间的不协调性。政府机构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受制于“部门利益”而出现顾局部而不顾全局,顾眼前而不顾长远,顾形式而不顾目标,顾表面而不顾实质的现象(唐钧),使得众多涉及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机构部门之间的协调变得非常困难,影响了政策的效果,并有可能构成实现社会政策整体目标体系的阻碍。同时,以政府部门为主体的社会政策体系,往往注重政策制定本身而忽视政策执行的客观环境和相关配套措施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策执行的难度,提高了政策执行的成本。这个问题在整个政策体系中都存在。政府部门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严重地压抑了机制活力的发挥。

三、完善超大规模社会的社会政策体系

社会政策体系在整体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有效的社会政策体系能提高社会整合度,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并最终有利于经济的增长、社会经济和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

首先应进一步明确社会政策目标,加强社会政策的整合。

任何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隐含着特定的价值倾向和政治承诺,反映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认同。譬如科学的发展观和学界所长期争论的公平和效率问题等。这些价值倾向会影响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某种社会政策的价值选择需要必要的制度支撑,反过来它又对制度变迁发生作用,而政策的实施也会因之对其他方面造成关联影响。当我们在反思不计代价地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教训时,必须深入探讨低成本的社会进步和低代价的社会政策体系,以此作为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取向。

社会政策应当充分反映我国多元化的社会变迁,另一方面,社会政策和相关的发展项目又可能将这种社会结构制度化,从而使得社会政策必须处在不断的设计、实施、评估、完善的过程之中。中国又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地区差异比较明显。如果忽视这些现实,将整个人口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社会政策设计,常常会将问题过于简单化和概念化,那些看似对所有人不分性别、阶层和社会特征都一视同仁的社会政策却恰恰可能是对不同人口群体的不公平对待。传统的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的理念难以及时地把握这种变革,并及时地找到问题的所在。因此,必然需要因地制宜地设计并运行适用于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兼顾各种人口群体利益的社会政策,重点

防止弱势群体被排斥在社会发展的主流之外,让社会各种不同的人口群体都能公平地分享社会发展成果。这种区域性或人口群体性的特殊的制度安排可能源自历史的延续性,更产生于由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包括人口和产业结构变动以及社会领域的治理机制呈现出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态势。实现普遍和广泛的“国民待遇”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没有理由再将农民的基本利益放在城市人口之后。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战略部署使我们看到了希望,而一些新的政策措施,如给予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户家庭的父母以养老奖励,说明只要有足够的政治承诺和必要的资金统筹,这些问题还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的。同时,由于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其破除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没有对依附于户籍之上的城市保障特权的破解,希望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就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

其次是进一步规范政府部门在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角色定位。

任何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隐含着特定的价值倾向和政治承诺,反映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认同,也触及到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权力分割问题。这些价值倾向对制度变迁发生作用,也会影响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无论生活在哪里,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一定形式的社会保障。在欧洲发达国家的福利国家模式下,国家是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社会权利的最终保护者。而在其他地方,社会保障政策则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以适应各国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由于发达国家“福利病”的警示,我国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种最低社会保障的政策推进思路,即通过社会保障实践不断地完善社会保障,从而达到社会保障适度原则的下限。就中国社会政策的现状而言,目前是福利国家模式、非正规保障模式和无保障模式并存,在国家整体性安排中存在因地、因人而异的多种形式的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度安排。这种区域性或人口群体性的、特殊的制度安排可能源自历史的延续性,更产生于由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包括人口和产业结构变动以及社会领域的治理机制呈现出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态势。此间,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社会政策领域的地方主义、城市中心主义和对农民利益的漠然。最典型的就是城乡二元的社会政策体系。

在社会政策领域,近年来,市场机制的作用得到高度的重视,但在一定程度上,笔者认为市场的作用被不适当地夸大了。社会生活的多样化确实直接影响了政府的权威,市场机制的改革与完善也对政府的职能提出了挑战。社会制度方面的改革以及“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使得政府运作

方式、介入公共事务的领域和程度都面临调整和转变。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行政强制的能力在弱化,政府推进社会政策的难度无疑提高了。但这种变化并不应当成为许多本来由政府承担或政府主导的社会政策项目被不恰当地转移给社会和市场的理由。比如对教育和人力资源的投资就应当是政府最主要的公共投资之一,市场可以在教育领域发挥作用,但决不能成为主导。我们的政府应当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过渡,而在社会政策领域,政府的主导作用应当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政府的愿望和政府行为常常受到政府财政的限制。政府在社会政策领域常会“力不从心”。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社会资源的总量总是有限的,用于社会发展的资源始终会是不足的。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已经成为政府部门和社会普遍接受的发展理念,而同样应当作为硬道理的社会公正、公平还没有被普遍认同。其结果是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看到,在我国现行的政府管理模式,带有一定普遍性的、以牺牲环境和社会发展为代价的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已经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资源的协调、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错误的社会经济决策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难以计数,而对于基本的社会发展却常常以资源不足为由投入少而又少。除了“政绩工程”等政府工作的评价体系之外,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片面理解和缺乏对社会发展的全面关注也是产生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在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以后有所好转,但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因此,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决定于可利用资源的总量,另一方面,更取决于资源的配置模式。这涉及政府对社会政策领域的政治承诺以及提供社会政策的水平和能力。一个有限的政府更应当是有效的政府,在加大对社会发展的资源投入的同时,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益也刻不容缓。

最后是创造良好的社会参与的环境。

实施社会政策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依法治国的过程,良好的法制环境是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的必要条件,而法制建设也触及到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权力分割问题。政府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决定了整个社会政策的效果,但在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一个有效的市场和强大的能与政府充分合作的社会机制同样发挥着作用。

不同于私人选择,作为社会政策基础的公共选择涉及集体决策,因此,会有较高的交易成本,也不可能充分满足所有个人的、多样性的利益诉求。普通公民是社会政策集体决策的委托人,而相应的政府部门则成为代理人。但是,集体决策如果仅仅依靠政府部门来做而没有相应的监控和公民的利

益表达机制,则很容易蜕变成特殊的寻租利益所在,这已经为大量的土地违法案件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所表现出来的、吏治的腐败所证明。

我们的政府部门应当成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典范。但在现实生活中,现行的制度安排未能有效地赋予人民群众对政府行为和相关政策制定以监督制衡的权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公仆”为其自身或集团的利益创造出各种能保证或维持他们相应权力的制度安排,设租与寻租的结合导致一些政府部门制定的规章、条例倾向于政府部门权力的扩张,构成权钱交易的恶性循环,这也是行政审批权难以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地方政府或政府的有关部门也会以其部门或地方的既得利益为基本出发点来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社会政策,而实际上破坏了部门之间的协调,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央保护农民利益的诸多政令措施难以落实,农村教育与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完善困难重重,都反映出一些部门和地方官员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对中央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消极抵制和不作为态度。

社会政策的实施对象是公民,公民及其所形成的社会是任何社会政策效果的直接检验者,而公民在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广泛参与和实施阶段的监督评估也是社会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公民参与”是社会政策的基石和精髓(莫泰基,1995)。同时,对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对于社会地位、权力的再分配带来改变和影响的不仅有政府的活动,也有其他社会组织的活动(杨团)。我国目前社会政策领域内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間受到制度环境的强烈制约,包括志愿者组织、社区性群众社团在内的社会机制尚处于萌芽状态,社会力量与社会参与机制尚处于培育阶段。

目前的社会动员模式最大的弱点在于,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对社会政策领域的参与主要集中在“下游”领域,即在社会政策相关事业的运营和商业性开发上。而社会政策的制定和社会事业项目的规划阶段、建设资金筹集阶段、项目建设启动阶段,在这些关系以后市场化和社会化能否成功的关键性环节上,基本上还是政府部门大包大揽。社会的广泛参与还没有真正成为社会政策领域的现实。

因此,政府不仅需要在社会政策领域继续发挥主导作用,还应当承担起培育社会力量、推进社会参与和引进市场机制的重要任务。从公共管理模式中单一的行政管理转向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伙伴关系和良性互动;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社会政策机制,走向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强的发展格局。在制度上,要保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有对社会不同人口群体特别是对社会性别平等的评估,社会政策对妇女发展的影响应当成为一项政

策能否通过和实施的标准之一。目前,已经开始实行的、对部分事关百姓利益的政策调整召开听证会制度可以在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普遍运用。

我国政府已经提出并正在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也正在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发展目标,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政策在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与经济政策同样重要的作用,逐步纠正过分强调经济增长和“市场机制”对社会政策领域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观念和认识上的提高,还不会自然而然地保证公平、合理、有效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感性的呼唤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社会平等发展的意识,而更重要的是通过机制和体制的改革,从制度上为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创造条件。

同时,学术界亟需加强对适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超大规模的社会性质及其社会经济全面转型特征的社会政策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综合和理论创新,建立中国本土化的社会政策理论和方法体系,从而能提供系统的公共管理与社会政策设计,具有社会政策评估和咨询能力,更好地为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问题服务。

【参考文献】

- M. Lavalette, A. Pratt:《社会政策:概念与理论导论》(*Social Policy: A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 Thandika Mkandawire: *Social Policy in a development Context*, UNRISD June 2001。
- 唐 钧:“社会政策发展报告”,见 http://social-policy.info/887.htm#_ftn12。
- 莫泰基:《公民参与:社会政策的基石》,香港:中华书局,1995。
- 杨 团:“社会政策的变迁和研究走向”,见中国社会学网, <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

文本与世界

——给新闻学院博士生的讲座纪要

胡守钧^{〔1〕}

大家下午好,李教授是我几十年的老同学,他请我上课,我很高兴。前两届我讲过两次,大家很有兴趣。上一届我讲的是“还社会于民”。再上一届讲的是“告别计划社会”。今天我想变个题目。大家如果对我原来两次题目有兴趣的话,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些探讨。前两次讲的是纯粹的社会学题目,讲中国社会当代转型。

在讲之前,我对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是复旦(本科)毕业的。原来学的是物理,然后转到哲学,搞了十几年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后又转向社会学。可以说我在复旦经历了三个系:物理、哲学、社会学系。研究的领域比较杂。我做过十年科学史的研究。然后是做社会学研究。做社会转型研究二十多年。我研究过最古老的东西,如《易经》、《道德经》,也研究最新的东西,就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我的学科背景资料,可以上“google”网站,输入我的名字,大概可以找到一千条左右吧。

今天讲的题目也是十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思考什么问题呢?这是个古老的问题,也是个最新的问题,就是“文本与世界”。这当然是个古老的问题,以前就有文本。那么,为什么在当前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我觉得从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的发展来看,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会有很多的麻烦。所以,这几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写过一些文章。我今天想把我研究的成果给大家做一个交流。我讲些提要,然后大家提些问题。

〔1〕 胡守钧(1944—),男,湖北武汉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中国社会及其思想。

一、对文本和世界的定义

我们首先对“世界”做个界定。什么叫世界？我想至少包括这几个方面：一个是自然界，毫无疑问，山啊，水啊，在人类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第二，是人参与进去的存在，就是人化自然。比如金茂大厦，我们学校的教学楼，它们也是世界，因为人对它有影响。同时，人化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上海的地皮人化的程度很高，月球人化的程度非常低，就是阿波罗去过一下，就没有什么了。火星我们现在是人化了一点点，刚上去了一下。所以，这一类也叫自然，是人化自然。第三，就是社会。根据个人来说，社会当然是个世界啰。第四个，是人的身体。总之，世界包含这些方面：自然、人化自然、社会、人的身体等。当然，对于世界的叫法，各个学派很不一样。有唯物主义的叫法，有唯心主义的叫法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肯定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是相同的，就是说（世界）对于任何一个认识主体来说，它都是存在的。我们讲的世界就是一个存在。

对于“文本”，我们也作个界定。文本的界定比较困难。今天中午，我还和研究生反复讨论这个问题，总感到非常棘手和繁难。因此，我想对讨论中所使用的文本这个概念，作比较狭义的规定，就是指文字符号系统。那么，文字出现之前，不是已有些语音符号吗？那算不算文本？如果不算，怎样理解那些口传的史诗？如果算文本，那和动物的语音符号有什么差别呢？这涉及语言学的许多问题，此处不讨论。

二、文本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

人是动物，然而与其他动物不同。

有什么不同？人有感情而动物没有？不是。猪、马、牛、羊、狗，哪个没有喜、怒、哀、乐？人有语言而动物没有？不是。猫叫、狗吠、狼嚎、虎啸、鸟鸣，谁说不是语言信号？人的语言有结构而动物的语言无结构？不是。断言鲸的语言没有结构、大象的语言没有结构、猴子的语言没有结构，谁相信？人有思想而动物没有？不是。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从鸟语、兽语、虫语，大约可推断，存在鸟思想、兽思想、虫思想。否则，动物的语言反映什么？人有组织而动物没有？不是。蜂群、蚁群、猴群、狼群，有首领、有等级甚至还有分工，能说没有组织？人会劳动而动物不会？不是。蜂采蜜、狮捕食、